◆观 点

警惕影响改革的不良心态

面对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上包括一些干部对改革的态度复杂，也夹杂着不少不良心态。

知足厌变，乐不思改。我国过去30多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难免会让一些政治精英沾沾自喜、引以为傲。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可以也应该“歇口气、喝壶茶、再赶路”，更有甚者认为，他们有理由也有资本好好享用一下改革成果了。于是，改革成就成了一些官员贪腐和享乐的“道德许可证”。更可怕的是：取得丰硕成果之后的改革懈怠，会将人们的注意力聚焦到成果的分配公平问题上，进而会瓦解共识。缺乏危机感和共识，意味着改革的群体性动力的丧失。值得警惕的是，实证调查发现，这种“知足厌变、乐不思改”的心态，往往将“保持社会稳定”视为改革顺利推进的第一位决定性因素，采取“借维稳拒改革”策略。

患得患失，犹疑不定。改革，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指向未来的理性设计。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和人类知识的有限性，因此，改革总是充满着风险和不确定性。加之当今中国政府机构的改革常常涉及公共权力的分解与让渡，这两方面特性直接将改革对象导向“损失”思维路径。行为决策学的研究发现，大多数人在面对损失时，都会油然而生“损失厌恶”之情，继而通过“神奇想象”和认知偏见等夸大改革的损失，最后理性地选择观望和规避改革，或是“随大流”。持这种态度者未必是所谓的“既得利益者”，但却是未来改革的风险承担者。他们担心“谁改革谁吃亏，谁先改谁先吃亏”。此外，既得利益者的现时幸福指数越高，风险意识就越强，改革的勇气就越小。总体而言，观望气氛越浓，改革就越难深入开展。

心灰意冷，冷眼旁观。不少地方的改革创新之举因“众口难调”“欲壑难填”而成了“自找没趣”，因而心灰意冷。除了改革行动受挫之外，一些干部还会因为自己的改革抱负和蓝图未被采用、自己对改革的预期屡屡受挫、自己屡屡成为改革的受害者或最少受益者，而对改革心灰意冷。

言行不一，阳奉阴违。过去几十年的政治经济改革，既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也造就了极大的受益不均和各式各样的既得利益者。“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面对可能触动自己“奶酪”的改革，譬如行政审批精简、公车改革等，一些部门和个体的内心非常抵触。只是慑于中央和上层的高压，不得不言不由衷地口头上高喊改革，实际上对改革极度反感，消极抵制、暗中使绊。他们往往以“时机不成熟”“一放就乱”“配套改革不到位”“设计欠周”等理由，延宕推进改革的步伐。

急功近利，贪大求洋。与前述四种消极心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领导干部或决策部门期望“一步到位”，“毕其功于一役”。之所以如此，或是因为他们对渐进式改革已失去耐心和信心，或是因为他们把复杂的改革过分简单化，或是过分迷信别国可用的法子，依样画葫芦，或是因为他们太想通过一场改革展示德与才了……这是极端现代主义的线性思维，忽视了中国社会实践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轻视改革的艰难曲折性。然而，越是激进冒险的、贪大求洋的改革主张，越有可能获得一呼百应的社会反响。这一点特别值得警惕。（2014年11月10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李春成）

法治中国要有法律信仰

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但接下来，建立起“不敢腐、不能腐”的反腐败法治体系，特别是实现吏治的制度化、法治化，这是个很大的战略性任务，也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赢得未来长期稳定与发展的基本前提。

就法治建设本身看，在中国，从来就不缺少法制，法制在农耕文明时代，本质是“治民”，即单纯把民众作为控制、管理对象。法治则是现代文明之果，法治的真谛是“治权”，即通过良好的制度安排，有效地制约和规范公共权力。建设法治中国的核心任务，是置宪法于崇高地位，维护公民权利，以宪法和法律作为国家治理和公民行为的准则。

中国社会，少的是法治精神和法治的文化基础。由于缺乏根深蒂固的法治精神，由于缺乏对于法律的信仰，在中国，修法律易，行法治难，并常以法治之名，行法制之实。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成了坚韧的“吏治——人治”传统。从民国建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短短几十年里，制宪频率之高，在世界亦为罕见。北洋政府时期，曾出台过10多部宪法和宪法草案，但都没有把国家推上法治化的轨道。

今天中国社会，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在全体公民中培育起对于宪法和法律的信仰。宪法的本质精神有两点：一是人民享有最高权力；二是政府授命于法。换句话说，是“保障民权，限制政府”，这是构成现代国家权力结构的基本原理，也是现代社会法治的实质所在。

在形而下意义上，法律是一种社会治理工具；在形而上意义上，法律更是一种信仰。任何国家，法治真正有效的推行，须深植于民众对于宪法和法律的普遍信仰。信仰所成的“不成文法”，比成文法更有权威。一个国家可以较快建立起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但建立起对于宪法和法律的信仰并使之社会化，则是个相当漫长也是困难的过程。

1997年十五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开启国家治理的法治化进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的重大命题，并提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位一体”的建设构想。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问题，这是推进法治建设的新开篇。毫无疑问，它将改变以政治意志治理国家的旧方式，迈入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新境界。

法治国家建设的核心，是国家政治结构和治理方式的制度化、现代化。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是强调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强调政府权力必须受制于规范严密的监督体系。法治社会建设的核心，是强化社会依法自治，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并通过一系列制度方式构建公众治理体系和监督体系。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构成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整体。在三者关系上，法治政府建设是整个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和核心。

发达国家经历了三百多年才形成法治，今天我们建设法治中国，还要充分吸纳世界各国法治的有益经验为我所用，加快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伟大步伐。（2014年第10期《决策》秦德君）

◆文 坛

作为父亲的嵇康

公元262年，嵇康被押上刑场，一曲空前绝后的《广陵散》后，曲终，人散。一代名士，终归尘土。

嵇康临刑前，在狱中写了一篇《家诫》，给他十岁的儿子嵇绍。洋洋千言，其语谆谆，但其主旨却是教育儿子以后不要像自己一样，不要做一个英雄，不要做一个名士，要听领导的话，要和领导保持一致，甚至连领导送人时，不要走在领导后面，以免被人猜忌是你在其中煽风点火这样的细节都一一列出。言语之中，不见桀骜不驯，不见放荡不羁，只有明哲保身的谨小慎微和看似琐屑的苦口婆心。

这实在颠覆了我们对嵇康一直以来的印象。印象中的嵇康是放荡不羁的名士，是离经叛道的英雄，他怎么可能说出这样谨小慎微的话来，他怎么可以如此怯懦卑微？

但这明明白白的嵇康，不是另外一个嵇康，而是一个作为父亲的嵇康。当一个人做了父亲之后他不再是一个视生死如草芥的汉子，也不再是一个可以洒脱地说出“生亦何欢，死亦何苦”的英雄。他变得庸常而世故，甚至卑微，因为他知道人世艰辛，世道险恶，他可以不在乎世人的诋毁，不在乎自己的生死，不在乎这世间的一切，却不能不在乎一双儿女的未来，这就是父亲。

嵇康临死之前，没有把自己的一双儿女托付给哥哥嵇喜，也没有托付给他一向敬重的阮籍，而是托付给了那个他曾经与之绝交的山涛。并且对儿子说：“巨源在，汝不孤矣。”

不是他信不过自己的哥哥，也不是他信不过阮籍的品行，而是作为过来人的他，明白这世间的险恶。自己被害，家族也不一定能够幸免。阮籍和他是一路人，同样不被世俗所容，同样前途未卜。而山涛虽然与自己道不同，志趣也迥异，但他相信山涛对于朋友的忠贞，更明白只有在山涛庇佑下，儿子才能在险恶的人间，做一个平凡的人，安安稳稳地活下去。

十八年后，嵇绍在山涛的大力举荐下，被晋武帝“发诏征之”，走上了和父亲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这也许是嵇康愿意看到的最好的结果。（2014年第29期《中国新闻周刊》杨雷）

◆史海钩沉

国家记忆：华工赴欧启示录

今年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欧美国家隆重举办了各种纪念活动，来反思这场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浩劫。一战不但夺去了1600万军民的性命，而且还重创了欧洲文明，摧残了欧洲大陆。作为纪念活动的一个场景，中国前外长李肇星特地前往法国努瓦耶勒市，凭吊安葬在诺莱特华工墓园的884名一战华工。当年，15万华工背井离乡、漂洋过海来到法国，参与了英法盟军的抗德战争，其中有近万名华工客死异国他乡。关于华工赴欧的这段历史往事，国内不少文章都有表述，但大多强调华工的悲惨处境以及英法对他们的残忍虐待。实际上，华工赴欧的壮举绝非只为养家糊口或充当炮灰，他们在战争中的献身精神及其所做贡献，值得我们后辈追忆、颂扬和深思。

以工代兵：百年前中国政府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外交创新

一战于1914年8月爆发，为帝国主义两大阵营（协约国与同盟国）之间非正义的殖民掠夺战争。按说战场在欧洲大陆，不关中国人的事，但中国的北洋政府从战事一开始，就表现出参战的积极性和热情，甚至于向英法政府表态欲派50万中国军队到欧洲助战。协约国出于各自利益考虑，一度阻止中国派兵出战，但又希望中国可助一臂之力，最终在1916年8月出现了中国招募华工赴欧协助英法抗德的历史性一幕。北洋政府当时为什么要介入这场欧洲大战？为什么采取“以工代兵”的谋略？今天该怎样理解百年前中国政府做出的外交决策？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曾以引进德国炮舰为傲的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闭关锁国、不思进取的大清帝国被明治维新、脱亚入欧的日本帝国打败。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肆意践踏中国主权、毁灭中华文明、强迫割地赔款再度激起国人愤慨，唤醒振兴中华的良知。在一战爆发前的20年里，大批仁人志士从思想上意识到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政体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灾难，感悟到“穷则思变、变则通”的革命道理，决心向西方学习、变革维新、救国救民。正是在大动荡的年代，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们，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强大政治动力。在这20年里，中国经历了戊戌变法的失败，也迎来了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曙光；中国经历了从农历到公历、从马褂长袍到西装革履的转变，更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吐故纳新的思想革命。一大批社会精英主动走出国门，到欧美国家去留学，去寻求真理和救国之道，他们立志要让在1912年创立了共和制的中国主动融入西方社会，在参与国际事务中赢得西方列强的尊重和自己的话语权。这些因素正是北洋政府介入一战的历史大背景。

一战的爆发也助推了中国日益觉醒的、参与国际化的民族主义，并且给了北洋政府一个千载难逢的外交良机。当时的政治精英梁士诒、顾维钧等人力主政府出兵参战，他们深入研究了战争对世界格局和中国命运的影响，强调参战可以使英法等西方列强重视中国的存在，真正促使中国加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而一旦协约国获胜，中国也将以战胜国身份收回战败国德国等在华获得的治外法权及租界特权。为此，他们推动北洋政府在1914年夏、秋及1915年三度向英法政府表态，希望参加协约国抗击德国及奥匈帝国的战争。然而，事情并不像他们想的那么简单，中国政府的表态遭到日本的再三反对。日本外相声称“中国非交战国，无列席战后和平会议之资格”；英国政府最初也表示不想让中国成为协约国的一员。从表面上看，仿佛日本和英国都只是不愿带中国玩。实则不然，他们不带中国玩的真正原因是，不愿意看到一个“东亚病夫”通过参战提升国际地位，进而威胁到他们在华获得的巨大不平等特权。日本正是在战时趁火打劫，攫取了德国在山东半岛和青岛原有的管辖特权等权益。

时至1916年夏，随着欧洲战事的升级，特别是交战双方期待毕其功于一役的索姆河战役的打响，英法政府开始转变态度，希望中国政府给予帮助。但由于老牌殖民帝国的心态作祟，它们要求中国采取变通之道，派遣大批劳工赴欧洲协助协约国，主要从事战勤及后方保障工作。面对英法态度的转变，梁士诒早就为北洋政府谋划了一个“以工代兵”的良方。在今天看来，这个方略堪称百年前中国精英智囊的一大外交战略，也是中国政府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一个外交创新。梁士诒“以工代兵”方略既能让协约国接受，又暗含大智慧。他指出：“中国财力兵备，不足以遣兵赴欧，如以工代兵，则中国可省海陆运输饷械之巨额费用。而参战工人，反得列国所给工资，中国政府不费分文，可获战胜后之种种权利。”虽然他的设想有些理想化色彩，如中国政府在战后可享有与英法列强同等之权利，但从实践过程来看，以工代兵的谋略在当时不失为中国外交的最佳选择。正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中国15万劳工奔赴西欧战场，还有约5万劳工在东线战场协助俄罗斯，在一战史上写下了华工光彩照人的一页。

工蚁炮灰：欧战华工军团捍卫国家主权的历史功绩

如果我们把参加一战的华工放到百年前中国政府融入西方社会、谋求国家利益的历史大背景下来解读，就不会得出华工赴欧仅仅充当“工蚁炮灰”的片面观点。诚然，华工在当时应募的动机主要还是养家糊口和求得生计，但他们在欧洲大陆的表现可圈可点、令人起敬。

从1916年5月中法政府签订招募华工赴欧洲战场时起，在短短两年中，有数万华工通过设在山东英租界威海卫的“大英威海卫政府招工局”被招募，他们分批陆续远渡重洋，来到法国和比利时战场。据史料记载，英法在华招募劳工有一套严格的招募及管理机制，以确保被招募者身体健康、遵守纪律、服从命令。以英国为例，华工在应聘时先接受英方的体检，被认可后要与英国政府签订三年的“打工”合同，里面明确其责任和权利。随后，他们要在华工集中营接受英方的必要培训，有点类似我们今天大、中学学生的军训。

华工编队按照英军的军事编制，有班、排、连、营四级，约500人组成一个劳工营，他们每个人的手上都戴有一个打着号码的“铜镯”。出国前，英国政府发给每个劳工一些工钱，让他们交给家里。到欧洲后，按照华工所定等级（翻译、工头及普通工人等）发放月薪。普通华工被要求每天工作10小时，报酬为五法郎。因伤致残或阵亡、死亡的华工，本人或家属也会得到一定的补偿金。

战争期间，英法大约在华招募了15万劳工，俄罗斯也在华北招募了5万人。赴欧洲西线的华工，近10万人被分配到英国，4万人被分配到法国，还有1万人被派给后来参战的美军。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从事战地后勤工作，包括维修道路和营房、挖战壕、运输物资、救护伤员、掩埋尸体、服务军工等。尽管华工伤亡惨重，但是多数华工还是得以在战火中幸存下来，并且在战后于1919年秋相继被遣返回国。大约有11万服务于英法的华工历经磨难，最终回国与家人团聚。在未回国的3万人中，有近两万人死于战火或疾病，其中，有名有姓的1874名华工尸骸，埋葬在69个欧洲公墓中。其余1万余华工留在法国工作、生活，成为客居法国的第一代华人。虽说天下乌鸦一般黑，英法两国对待华工总体是奴役、驱使，但客观上说华工毕竟不像19世纪英法在殖民地的黑奴，他们有自己的人格尊严，他们在战争中不畏牺牲、吃苦受累的精神，也是英法当局所钦佩的。法国元帅福煦曾经评价华工“是第一流的工人，也是出色士兵的材料”。要说对待华工的差别，英国政府要严厉苛刻些。相比之下，法国管理华工要宽松些，待遇也较好，行动自由得多。因而战后才会有一批华工选择留下来，进一步融入西方社会。

总体观之，欧战华工军团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或贬低的。他们对一战的贡献主要表现为：其一，华工赴欧参战，既充当了北洋政府寻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载体，又为中国后来参战创造了条件，进而为战后中国参加巴黎和会提供了良机。其二，华工成为百年前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实现国际化战略以及国家认同理念的重要环节。华工在参战之余，接触到了欧洲先进的文明及科学技术，也受到西方自由民主法制思想的熏陶，他们开始自珍自爱、关注祖国的前途命运。回国后，他们成为西学及实业知识的宣传者，有的还转变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其三，华工爱国自强、勇于献身的情操，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后来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的知识精英们，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周恩来、邓小平，均在留法期间确立了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革命理想。1919年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以及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兴起的新式工人运动，皆同一战赴欧华工有密切的关联性。（2014年第21期《世界知识》王平贞 赵俊杰）

◆评 论

踩实中国外交的“丝路”步点

APEC峰会期间，各国就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了共识，沉寂多年的亚太自贸区重新复活。先是在8日举行的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其后，习近平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强调“亚太发展前景取决于今天的决断和行动，我们有责任为本地区人民创造和实现亚太梦想”。

从宏观而言，亚太自贸区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东西两端，东接亚太经济圈，西入欧洲经济圈，可以说，丝路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轴，亚投行、亚信峰会、丝路基金以及各类经济走廊、自贸区都是围绕这一轴心展开。

丝路外交从理念到制度构建不过一年时间，去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尼提出了两大经济带的建设，今年10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在北京签署备忘录。丝路外交的核心在于推动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实现资本、资源、人员、思想的联通，而第一步则是要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搭建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本次APEC峰会的主题就包括“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基建不仅能够拉动短期经济增长，也是实现经济长期繁荣的基础，这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亚投行的建设以及丝路基金的推出，可以说恰逢其时，基建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中国有技术、有能力、有意愿加强中国与世界的互联互通。

丝路外交是中国与世界关系重构的关键一步，中国经济正在从追赶向超越过渡，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家，中国有必要扛起自由贸易的大旗。中国三十多年来，借助开放经济与自由贸易而破茧成蝶，也符合近代强国崛起的规律，英国、美国在崛起之后都力推多边自由贸易机制。WTO多哈谈判几无进展，而各种双边或者三边的自贸区协定又使得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呈现碎片化的态势，美国主导的TPP和TTIP，与东盟推动的RCEP都试图在更大范围内建立更高级别的自由贸易平台，而中国在本次峰会上推动的亚太自贸区可以说是实现RCEP和TPP互动的中道选择。一带一路既是历史记忆的现代传承与提升，也是中国主导的多边自由贸易平台。

丝路外交着眼于中国的资源获取、商品市场与战略纵深，未来的图景宏伟，但需要精细的制度构建，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贯彻其中。丝路外交所涵括的区域广泛，国家众多，情况复杂，需要有足够的战略耐心与定力，以互利共赢获得互信认同。一年来，中国领导人多次出访丝路沿途国家，相关国家对丝路经济带的建设也表达了充分的理解与支持。除了双边的沟通与磋商之外，还需要多边制度框架，以减少时间与资源的成本。亚投行是个良好的开端，借鉴现有多边金融机制的经验，制定和实施严格的规章制度，使之成为开放、包容的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创始成员国有21个，既是亚洲国家对基建投资的认可，同时也给未来扩容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若亚投行成为一个规范、可信的多边金融合作平台，相信会有更多国家参与其中。

丝路外交，代表着中国外交的新思路和新方向。从被动应对到积极有为，从外交服务经济建设到经济与外交并行，因为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世界，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无法框定在国界之内。丝路外交勾画了一幅涵括欧亚大陆的自由经济蓝图，中国的意志、利益与智慧贯穿其中，犹如高铁一般的经济发展“便车”，丝路沿途国家都可以顺风搭乘。当各国感受到中国的实力与善意之后，丝路才会实现真正的互联互通。（2014年11月17日《时代周报》社论）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邮政编码：100091 总编辑：钟国兴 社长：王金龙 广告部电话：62805980 62806380 发行部电话：62806227兼传真 总编室电话：62805368 62806234 电子信箱：xuexishibao@126.com
定价：全年180元 邮发代号：1—267 国外发行代号：W3970 开户银行：建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户名：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账号：261300045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